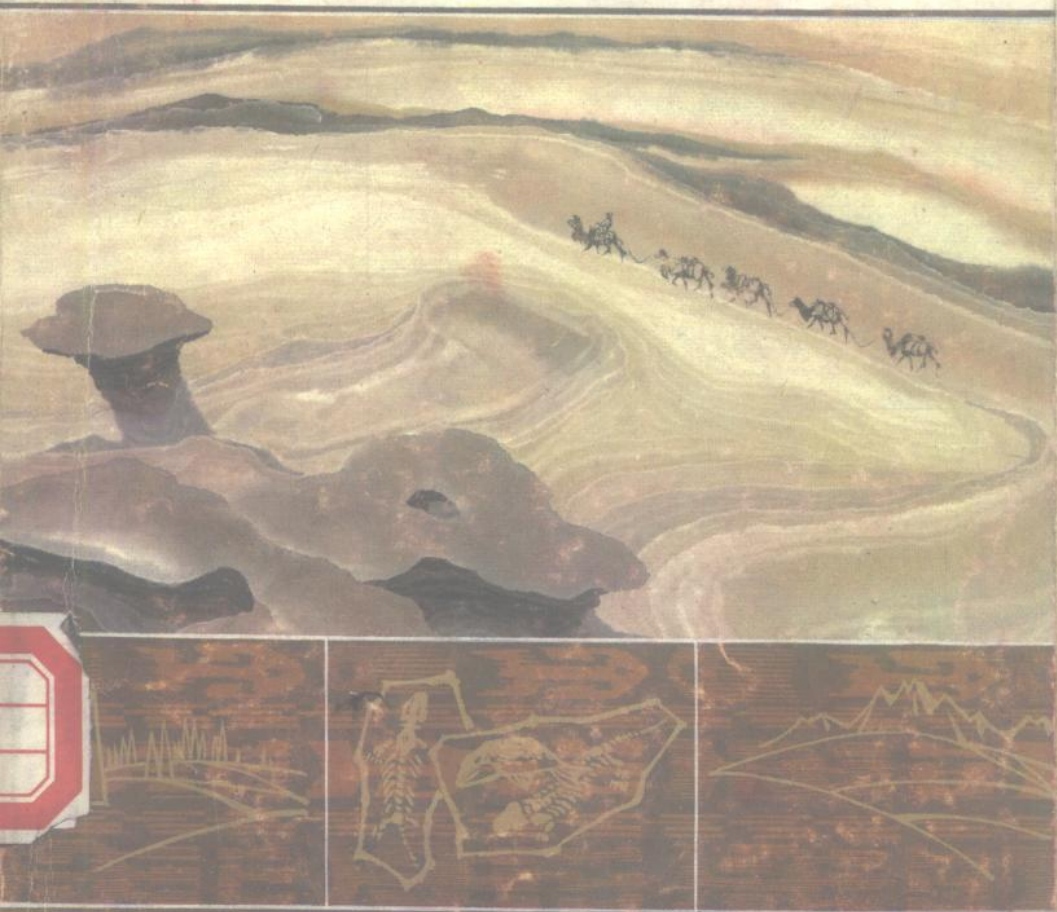


西域历史地理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HIYUH



新疆大学出版社

西域历史地理

苏北海 著

西域历史地理

苏北海 著

★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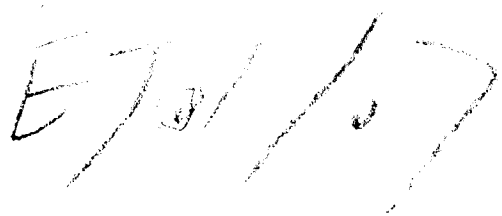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 插页2 13印张 337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

ISBN 7—5631—0041—5/K·0002 定价: 3.95元



序

西域之名由来已久，《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奇兵，时遮击使西国者。”清徐松认为：“古音国读如域”（《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因此，《史记》“西国”即是“西域”。

《汉书·西域传》卷首即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通鉴》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自大宛破后，西域震惧，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尽管这些文献都不出自西汉，但西域一名在公元前11世纪已经流行，大概可以无疑，而徐松对《史记》“西国”的解释，看来信而有征。当然，《大宛列传》记及的西域国家，只有大宛、乌孙、康居、奄蔡等十余国，而《西域传》则云：“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比《大宛列传》所记载的要多好几倍。这是因为，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设置西域都护府的行政管辖机构，西汉的后期，汉王朝与西域的关系以及人们对西域的知识，比汉武帝时代有了很大的增加，这就是《汉书》能够写出一篇《西域传》的重要原因。《汉书·西域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详尽的西域地理著作。

自从《汉书·西域传》开始，西域就成为一个稳定的区域地名。此后，正史之中，如《后汉书》、《魏书》、《北史》、《隋书》直到《明史》，都以西域之名立传。即不以西域之名立传者，西域之名也习用为常。例如《晋书》只立《四夷传》，但在

焉耆国下云：“遣沙州刺史杨宣率众疆理西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必须指出，在我国历史上，除了西域这个区域地名以外，还出现过南域、东域等区域地名。《后汉书·西南夷传》云：“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后汉书·乌桓传》云：“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但南域、东域等区域地名，不过在史书上偶然一见，未得流传。而西域之名却绵延长久，影响深远，这当然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西域范围广袤，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文复杂，加上地理位置冲要，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部分，而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壁画经营，特别是汉、唐两代的光辉业绩，奠定了这个地区不断发展的基础，使西域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地区。

正因为此，自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以后，记载西域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聚落城邑、风俗习惯、民族宗教、人物掌故、交通物产等等的文献，一代一代地不断涌现，广泛流传。有的虽已亡佚，有的至今尚存，成为这个地区的重要文化遗产。仅仅在《水经注》卷一、卷二《河水篇》中为酈道元所引用的北魏以前的涉及这个地区的文献，就有晋释道安《西域记》，晋郭义恭《广志》，晋释法显《佛国记》（即《法显传》），晋支僧载《外国事》，竺法维《佛国记》及不知撰者的《佛洞传》等。魏晋南北朝以后，西域文献大量增加，流传更广。比较重要的如隋裴矩的《西域图记》三卷，唐玄奘、辩机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唐敬播等的《西域图志》六十卷，唐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唐杜环的《经行记》，元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元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明陈诚、李暹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等等。入清以后，由于朝廷在这个地区建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区，以后又建新疆省（辖境远过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把这个地区置于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于是，这个地区和内地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有关

这个地区的各种文献进一步增加，如傅恒等的《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俞浩的《西域考古录》十八卷，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五卷和《汉西域传补注》二卷，朝廷官修的大型方志《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也于乾隆年间修成。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地处边陲，但与我国的其他边远省区相比，历代以来的文献资料，确实堪称丰富。

由于这个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清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和探险家之流，也在这里进行了各种活动，写出了不少对于这个地区的调查报告、论文和专著。例如沙俄地理学会副会长谢苗诺夫—天山斯基（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Семё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й，1827—1914）曾经多次活动于这个地区，在他所著的三卷《俄罗斯地理学会五十年来的活动史》之中，对这个地区的各种情况有很多记载。又如沙俄的另一地理学家普尔热瓦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1839—1888），曾经多次深入这个地区，著有《亚洲中部旅行记》多册，又如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也曾多次在这一带活动，撰写了《古代和阗》、《塞林提亚》、《亚洲最深的腹地》、《在中亚古道上》等著作。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曾经长期往返于这个地区，撰写了大量报导和论文，如《库车》、《敦煌的织物》、《敦煌的幡幢和壁画》以及后来由几个西方博物馆所收藏和出版的所谓《伯希和档案》。此外还有瑞典人斯文海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其足迹遍及这个地区，撰写了《中亚考察报告》、《戈壁沙漠横渡记》、《浪迹无定的湖泊》、《丝路》等著作。

按以上所简单介绍的来看，西域地区，从古代到近代，各种文献资料，包括中文和外文的，都是相当丰富的。对于我们从事这个地区的各种研究，特别是历史地理的研究，这些文献资料当

然是很可宝贵。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上面列举的所有文献资料，它们既有各不相同的价值，却也都存在着各种缺陷。从中文文献资料来说，由于它们的撰写年代多半比较古老，而西域地区范围甚广，沿革变迁频繁，民族宗教纷杂，语言文字多样，因此，古代的各种文献资料，往往言人人殊，彼此抵牾，记载错误者有之，事涉荒诞者有之，这是以下还将论及的。至于近代发表的许多西文资料，因这些西方学者和探险家，他们角逐西域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者向外扩张势力的时候，他们在西域地区活动，足迹遍及我国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和蒙古等地，按照各自的政治背景行事，他们有的调查资源，有的测绘地图，有的盗窃文物。他们名为探险、考察，实际上是对我国主权的侵犯和资源文物的破坏。他们撰写的大量调查报告、论文和专著，当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其间也有不少走马看花，浮光掠影，主观片面，捕风捉影的东西。斯文海定的《浪迹无定的湖泊》一文，把罗布泊说成是一个在沙漠中游荡摆动的湖泊，并且凭空臆造了湖泊摆动的周期。所有这些，苏北海教授已在他的著作中作了有力的批判，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这里打算阐述一下的是我国古代的一些记载西域地区的文献资料的情况。如上所述，我国古代有关西域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这是有利的一面，但另外一面是，不少古代的西域文献，是根据道路传闻撰述的，加上这个时代人们科学知识的落后，对于许多自然现象，都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因此，在这些文献中，夹杂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造成不少人对于这个地区的错误观念。在历史自然地理中，昆仑山及其所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昆仑山原来是古代神话中的一座并无其实的神山。首先提出这座神山的，或许就是已经亡佚的《禹本纪》，司马迁见过此书，并且在《大宛列传赞》中引及一句：“《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焉。”以后，许多古

籍都描述了这座神山，《山海经》、《西山经》和《海内西经》称其是“帝之下都”，“面有九井，以玉为槛”。《楚辞·天问》说它上有“县圃”。《淮南子·坠形训》说它是“太帝之居。”但司马迁根本不相信这种荒诞不经的传说。他在《大宛列传赞》中说：“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汉武帝却根据张骞对河源的错误考察和古代流传的这个神话，把昆仑山定下了具体的地理位置。这就是《大宛列传》中所说的：“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曰昆仑云。”

由于汉武帝给予具体地理位置的这座昆仑山，原来只是一座神话中的并不存在的山岳，因此，尽管汉武帝把昆仑山定为河源所出之山，但以后的许多古籍，并不一定遵循汉武帝的意旨。例如《汉书·西域传》就称“于阗在南山下”，而不称“在昆仑山下”。而此后如释道安《西域记》、康泰《扶南传》、《括地志》

《十六国春秋》等古籍，对于这座西域名山昆仑山的地理位置，彼此甚相径庭，以致到了唐代，《艺文类聚》（卷七·山部上·昆仑山）不得不引述了十二种古籍的对于昆仑山的各不相同的记载；而到了宋初，《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地部三·昆仑山）竟引了二十七种对于昆仑山的五花八门的说法。直到清代，万斯同在《昆仑辨》（《群书疑辨》卷十）中还说：“古之论河源者，皆谓出于昆仑，而传记所载不一，……吾为博考古书，其言昆仑者约有十余家。”直到清末，陶葆廉在《辛卯侍行记》（卷五）中仍说：“按传记昆仑凡七处：一在海外，一在西宁，一在肃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南，一在卫藏之北，一在北印度。”

从昆仑山这个例子，可见长期以来人们对西域自然地理概念的模糊。在西域自然地理中另一个长期流传于我国的十分荒唐的例子是关于黄河河源和黄河重源的谬说。这个错误的传说，也可

能是张骞带入内地的。《大宛列传》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张骞或许是根据当地的错误传说，把今塔里木河支流和田河的上源，作为黄河的上源，而这条“黄河”在注入盐泽（罗布泊）以后，又伏流地下，以后再度冒出，成为河源。《汉书·西域传》随即附和说：“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从此，这个黄河伏流重源的说法就风行一时，到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的时候，他遍考群书，结果都是一样，所以他在卷一《河水注》中说：“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对于这种荒谬的传说，尽管《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古雍州下·西平郡）早已指出其“终是讹缪。”而《舆地广记》（卷十六·陕西秦凤路下·积石军）更明确批评：“河出昆仑，自古言者皆失其实，《禹本纪》、《山海经》、《水经》固以迂怪诞妄，而班固所载张骞穷河源事，亦为臆说。骞使大夏，见葱岭、于阗二河合流于蒲昌海，其水亭居，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此乃意度之，非实见蒲昌海与积石河通流也。”但是历代以来，多数人均沉溺于这种谬说，直到清代，不少著名学者，仍然坚信不疑。例如胡渭认为“道元之注，……至葱岭以下，发明颇多。”

（《禹贡锥指》卷十三上），董祐诚认为：“郦氏之注，辨正积石之河为葱岭之河重源所发，至为详尽。”（《水经注图说残稿》卷一），吴省兰认为：“《水经注》称其回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可以证伏流矣”（《河源图说》，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四帙十一册），范本礼认为河出葱岭而重源于噶达素齐老山（《河源异同辨》，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四帙十一册）。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这类谬说，由于流传甚久，是很能蛊惑人心的。以徐松为例，

他曾经谪戍新疆数年，亲历天山南北路，对西域地理概况，作了许多实地调查，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但是对于黄河伏流重源之说，他却仍然囿于前人之说，无法摆脱。他在《汉书西域传补注》“皆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下补注说：

“罗布淖尔水，潜于地下，东南行千五百余里，至今敦煌县西南六百余里之巴颜哈喇山麓，伏流始出。”可见一种谬说，一旦流传甚久，传播广泛，危害实在匪浅。而要辨正事实，消弭影响，却又不胜困难，古今都是一样。

象上述昆仑山和黄河伏流重源的错误，在西域历史自然地理中当然是荦荦大者，其他一般的错误，还有不少，不再一一列举。至于在西域历史人文地理方面，长期以来，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之中，也同样存在许多错误概念和说法纷纭的问题。由于这个地区民族和语言文字复杂，沿革变迁频繁，以致许多古代的国家、区域、城邑等等，常常彼此混淆，造成错误。这中间，捐毒和身毒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水经注》卷二《河水》经“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注云：“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国。”这里，武英殿本按云：“捐毒，近刻讹作身毒。”其实，把捐毒误作身毒的《水经注》版本甚多，包括明代的黄省曾本、吴琯本、朱谋玮本以及清代的项绶本、沈炳巽本、赵一清本，张匡学本等，都发生了这个错误。甚至在殿本作了这个正确的按语以后，刘宝楠在《愈愚录》（卷六）中，还自以为是，反指殿本“以身毒为捐毒”的错误。为什么这样多版本均同其错？原因是因为这个错误始于唐朝的大学者颜师古。颜氏注《汉书·西域传》，在无雷国条“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下云：“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按身毒，《后汉书·西域传》云：“天竺国，一名身毒。”这是正确的，天竺就是古代印度，身毒是天竺的别译。印度在梵语作Sindhu，在波斯语作Hindu，天竺、天竺、身毒，包括《水经·河

水注》中的新头、新陶，此外还有贤豆、信德等，都是同名别译。但捐毒却不然，捐毒读作Yuándú，是古代西域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今新疆乌恰县境，去印度甚远，绝不相涉。在新疆作过实地考察的徐松对此就了如指掌，他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说：“捐毒在葱岭东，为今布鲁特地；身毒在南山南，为五印度地，二国绝远，颜君（按指颜师古）比而同之，斯为误矣。”

此外，西域历史人文地理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条支的地理位置，历来就有许多不同说法，碎叶城（素叶水城）的地址，古代文献上的传统记载与近代考古发掘的结果竟相径庭；又如别失八里，此名有唐城与元国之别，说法多有分歧；而瞿萨旦那与今和田的关系，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意见。诸如此类的问题甚多，不一一列举。

如上所述，可见西域地区在历史上名声甚大，历来研究者甚多，而文献资料也甚丰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论是在历史自然地理或是历史人文地理方面，不仅是以讹传讹者比比皆是，而说法纷纭者亦复不少。这就说明，对于西域历史地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和科学的研究，实在十分必要。从这样的要求出发，则苏北海教授长期来在这个领域中的辛勤劳动，确实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有幸首先阅读了这部《西域历史地理》的原稿，确实获益不浅，觉得著者多年来在西域历史地理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值得称道的。全书收入的24篇论文都是独立的专题研究，它们内容广泛，材料丰富，不仅兼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而且各专题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在西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著者对西域的许多山川湖泊作了深入的考证，诸如山岳中的西域阴山、帕米尔、考夫曼峰、符列夫斯基峰、波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峰等，河川湖泊中的蒲昌海、雷素海、蒲类海、乳海等，资料完备，说理周详，令人信服。并且还以雄辩的数据，驳斥了罗布泊游移的谬说，廓清了长期来西方学者在这

一个问题上所传播的错误概念。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著者以丰富的文献资料 and 精辟的见解，对汉、唐和其他各代西域的沿革变化，辖境推移，民族流动，城邑兴衰等等，作了细致的分析和深刻的论述。此外，对于这个地区区际内外的交通道路以及农牧工矿（特别是黄金采掘和制盐）的分布和发展，也都有详细的考证。这是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写作的一部《西域历史地理》。前面已经提到，自古以来，有关西域的史地文献，真是车载斗量，不可胜计，但它们显然都不能与苏北海教授的著作相比。

当然，古今时代不同，在各种条件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今胜于古，这是必然的趋势。何况《西域历史地理》的撰写，除了现代的观点、方法和科学技术提供的成果以外，仍然在颇大程度上利用了古代文献。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古人的研究仍然具有价值，另一方面更说明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古为今用的意义。《西域历史地理》所论述和考证的，虽然都是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问题，但是著者考证和论述这些问题的动机和目的却是清楚的，是为了把事实考证明白，古为今用，为现代西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研究提供依据，也为现代西域的其他研究提供依据。由于过去流传的不少以讹传讹的说法经过本书著者的深入研究而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因此，《西域历史地理》中的许多考证和论述，不仅有裨于今日，而且有裨于将来。

苏北海教授在西域历史地理研究中，除了运用历史学的和地理学的方法以外，还常常运用地名学的方法。这不仅是此书的一项特色，同时也是一种创新。我在早年就已经在拙作《论地名学及其发展》（1981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一文中指出，地名学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现在，我从《西域历史地理》一书中又一次看到了地名学与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此书不少专题的讨论中，地名学好像是一把钥匙，它打开其中的许多关键问题。著者除了在专题讨论中广泛地运用地名学以外，全

书的最后一个专题《新疆南路旧土尔扈特蒙古游牧区域的地名地理》，是专门以一个地区为例，运用地名学这把钥匙，深入地探索这个地区的历史地理的范例。著者归纳了这个地区的地名来源，其得名计有来自地形、水、动物、植物、土壤、矿产、气候七种，从而说明了地名与地理的关系。著者把这个专题称为“地名地理”，确是深得其中要义。

作为此书的最早读者之一，有感于此书对我的启发，所以拉杂地写了以上这一些。前面已经指出，苏北海教授的研究工作是值得称道的，这当然不是说，由于此书的出版，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苏北海教授在全面、系统和科学地研究西域历史地理方面，作了一个良好的开头。不仅是此书讨论的这些专题，都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而更多、更广泛的其他专题，犹待不断地发掘和探讨。希望因此书的出版，迎来一个西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高潮。

陈 桥 驿

1987年7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前 言

今天新疆的境界，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强占我国大片领土以后形成的。西域远在西汉归入我国版图之时，西部的界域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南部直至喀喇昆仑山的南北两麓，后来到唐朝及喀拉汗朝、西辽、元朝的西部疆域都较汉代为广，至清朝盛时也仍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在内，因而这一部西域历史地理，所叙述和考证的虽然有的越出了今天新疆的范围，却仍然是属于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

西域位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古来一直是国际纷争的场所，从而边界问题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以在这部书中首先揭示了这些问题。

还由于西域处于欧亚大陆的冲衢，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区，更是民族十分复杂的地区；同时民族的西去东来，南进北出，更是频繁。因而西域地区的地名演变和各种历史活动，无不打上民族的烙印，如果离开了民族这一特点，单纯从汉文的对音等入手，很难写清西域的真实历史，这是研究西域的任何一个历史活动所不可忽视的问题。

同时西域地区由于深处欧亚大陆中心，四面离海洋较远，平原地区的干旱又成为西域地理、气候的突出特点，是以历代西域历史上的动乱往往是为了争夺水、争夺草原；而城市的兴衰、土

地的荒芜，都与水有密切关系；楼兰古城的废弃，塔里木盆地多古城的埋入荒漠，全是基于水的改道或水利设施的破坏所造成。

西域历史地理的另一特点还表现在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西域地区从古以来就是许多不同宗教在此活动的中心，因而萨满教、祆教、景教、犹太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先后为各不同民族所信奉，是以不少地名和历史文化都遗留着各不同宗教的痕迹。

正是由于历史上各不同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西域几千年历史的演变和多少次民族的迁徙，所留下的不同地名和各种历史遗迹，都与各民族的语言有关，是以研究西域历史地理，首须重视民族语言，才能探究出地名和历史演变的真谛。

这部西域历史地理，尽管对上述一些突出的特点给予了重视和进行了新的研究，但限于学识水平，错误在所难免，希各族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苏北海

1986年11月10日

目 次

1	汉代乌孙居地考	(1)
---	---------------	-----

1	乌孙原居地及其与月氏的关系	(1)
2	乌孙西迁伊犁河流域的斗争过程	(6)
3	乌孙西迁伊犁河后的境域	(10)
4	乌孙首府赤谷城的位置	(14)

2	两汉在西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及帕米尔高原 的统治疆域	(22)
---	-------------------------------------	------

1	前言	(22)
2	塔里木盆地南道诸属国的位置	(24)
	(1) 以农业为主的属国	(25)
	(2) 以游牧为主的属国	(29)
3	两汉对帕米尔高原的统治	(32)
4	若羌游牧部落的分布地区	(37)
5	两汉在喀喇昆仑山及帕米尔的界域	(41)

3	和田名称新考	(46)
---	--------------	------

1	和田、瞿萨旦那两名不容混淆	(46)
---	---------------------	------

2	把和田附会于瞿萨旦那的原因·····	(43)
3	秦、马秦两名与和田的关系·····	(53)
4	和田名称来源于古代尉迟部落·····	(56)
4	吠哒国疆域及其在中亚的统治·····	(65)
1	吠哒族源及其西迁路线·····	(65)
2	吠哒国的统治疆域·····	(68)
3	吠哒国与中原北魏王朝的密切关系·····	(74)
5	龟兹王都及汉唐都护府在龟兹位置考·····	(81)
1	龟兹国王都的地点·····	(81)
2	白山考·····	(83)
3	汉代西域都护府在龟兹的位置·····	(87)
4	唐代安西都护府城址考·····	(90)
6	唐代安西都护府的设立及其所属都督府州考 ·····	(98)
1	安西都护府的设立经过·····	(99)
2	塔里木盆地的都督府州·····	(103)
3	阿姆河以北及锡尔河地区的都督府州考·····	(108)
4	葱岭及阿姆河以南的都督府州考·····	(114)
7	唐代在西域草原设立的都护府、都督府州考 ·····	(128)
1	两个瑶池都督府·····	(128)
2	两个游牧都护府——昆陵、濛池·····	(132)
3	从金山都护府到北庭大都护府·····	(137)
4	草原的都督府州·····	(148)